

## 后苏联时期高等教育的三十年改革：成果与教训

安娜·斯莫伦采娃

安娜·斯莫伦采娃 (Anna Smolentseva)：英国剑桥大学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社会学系博士生

电子邮件：asmolentseva@yahoo.com

在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全面战争后，显然，我们需要更多地反思后苏联转型的本质、结果和教训。高等教育只是整个图景的一部分，它无法解释一切，也无法独立于其他社会和政治机构运作。然而，由于它涉及知识、社会规范/价值观和社会价值，因此理解其对社会的贡献非常重要。本文讨论了后苏联时期高等教育的主要发展情况，以及尽管该地区 15 个国家的高等教育参与率有所增长，这些发展却限制了高等教育对后苏联社会潜在的贡献。

### 否认苏联、推动新自由主义

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崛起和苏联体制的逐渐解体大约始于 20 世纪 80 年代。苏联晚期时期的领导层尝试通过政治和经济自由化以及市场机制来复兴社会主义。后苏联的新自由主义改革建立在苏联晚期时期的遗产之上。

1991 年苏联解体后，社会主义过去被视为“悲剧性的试验”，一种背离“正常”发展的死胡同。随之而去的还有社会中追求更大公共利益观念。取而代之的是新自由主义的个体，他们为自己和家人工作，关注自我，做出自由的消费选择，投资于他们的高等教育，并根据预期的劳动力市场结果选择他们的高等教育和职业路径。减少公共资金、市场机制和竞争是新自由主义模式的一部

分，这个模式在大多数后苏联国家以不同程度实施。高等教育改革与许多其他具有高人类成本的社会经济改革同时进行，这些改革伴随着政治动荡和军事冲突。

### 系统层面的变革

30 年来，后苏联国家的变革塑造了 15 个形式不同的国家高等教育系统。这 15 个系统都是从同一苏联模式演变而来的，该模式限制了各机构部门及其声誉追求。在 20 世纪 90 年代引入位置竞争 (positional competition) 的市场有助于强化那些原本就强大的教育机构的优势，并扩大顶级和底层机构之间的差距。从这个意义上说，在机构分层方面，后苏联体系可以与其他市场化体系相媲美。

从机构分类系统、学位系统、教育提供者范围、机构排名、部门隶属关系、基于绩效的资金分配、国家入学考试和其他手段的学生分类等方面，国家进一步塑造了横向与纵向的差异。保持或减少系统层级也是一种政治选择，由于大多数国家拒绝了苏联的平等理想，因此没有政策承诺克服社会不平等。在一些国家，与苏联时期相比，高等教育的参与率和女性参与率下降。

### 机构层面的转变

市场化主要发生在主导的公共部门内，并加剧了系统内的社会不平等，不仅在机构

层面，也在机构内部。所谓的双轨学费制度将每个公立机构的招生分为国家资助和自费两个部分。从苏联时期免费的高等教育转向有偿高等教育的基础可以追溯到苏联晚期时期。这有助于解释为什么所有 15 个国家都采用了相同的模式。在 13 个国家中，公共部门的学生中有一半或更多要支付学费（在亚美尼亚、格鲁吉亚和吉尔吉斯共和国，付费学生的比例超过 80%）。公共部门的其他学生接受国家资助教育。与所有其他国际资助模式不同，这一系统并未对所有学生适用相同的规则，维持了社会价值（资金/能力）的双重标准。

尽管金钱至关重要，但它将不平等合法化并促进不平等。特点是，在后苏联社会，人们几乎从不对这个系统提出质疑。它再造（reproduce）了高等教育作为共同利益和平等主义承诺的苏联价值观与高等教育作为私人利益、消费者选择和正常化不平等的后苏联理念之间的文化分歧。但是，只要国家进行干预，就可以减少内在的不平等。例如，2012 年，爱沙尼亚对保持正常学习进度的学生取消了双轨学费制度。

## 高等教育的目的

新自由主义改革成为重塑高等教育以满足劳动力市场需求和结果的基础。对于后苏联体系，这种“职业化”更容易被采用，因为它呼应了苏联对国家经济需求的定位。苏联体将高等教育视为社会和经济发展的工具，用于培养国家经济的干部并为社会主义的集体利益培养新的个体，一个没有剥削的平等社会。

尝试克服苏联偏见的“改革”强调了高等教育作为个性全面发展的内在价值，优先考虑了教育的人文目的。基于人力资本理论

和新自由主义的想象，后苏联高等教育将高等教育缩减为经济发展的工具。它关注劳动力市场和就业能力，但这次是为了个人而不是集体利益。

## 知识的商品化

或许更重要的是，市场化影响了高等教育的核心——知识，使其失去了内在价值。知识变成了一种商品，且以各种形式呈现。在资金不足的情况下，被描述为“资金来源多样化”，所有高等教育都只能销售“知识”。在这里，“企业家大学”的模式非常有用，以确保国家无需采取任何措施，而各机构必须自行筹集资金，而它们确实做到了。最先出售的“知识”形式是高等教育学位，这得益于双轨学费模式的实施。

通过支付费用为在国家考试中表现不佳的学生提供入学机会，使得高等教育中的非卓越现象合法化。这种做法助长了将高等教育视为一种可以购买的商品的观念，而不是展示个人自由选择的胜利。对于长期受到低工资、不稳定就业、缺乏社会地位和分层等问题困扰的学术职业来说，知识商品化导致了高等教育学术核心的侵蚀。这使得应用知识、应用研究和咨询工作的优先级提升，以弥补公共资金的不足。

知识商品化还促进了构建学术论文的大规模市场的发展，包括博士论文、学生论文和期刊文章。一切都变得可以出售。学术价值和学术自由从未在后苏联时期得到巩固，反而因外部政治压力进一步被削弱。

## 高等教育对社会的贡献及其限制

后苏联时期的痛苦经验在于，高等教育市场化和商品化的性质及其影响在改革之初并非未知，这在国际文献中已有讨论。后苏

联转型是全球转变的一部分，这一转变优先考虑个人利益/价值而非集体利益/价值，并优先考虑自然和自发的经济秩序而非政治行动。

尽管过去 30 年中高等教育得到了扩展，我们看到了一些高等教育发展的良好机构示例，但只有在系统和全球层面实现了高等教育对社会的贡献，才能被认为是成功的。这种情况并没有发生。竞争是新自由主义视角的一种迷恋，它将个体学者、学生、机构、国家体制、政治家、国家和社会分开，并使他们无法共同努力以实现共同目标（如和平、

应对气候危机、处理大流行病、追求正义等）。这种情况可以而且应该改变。

注：这篇文章基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与俄罗斯国立高等经济学院（the National Research University Higher School of Economics）于 2022 年 2 月 14~15 日举办的“下一代：反思和展望前苏联高等教育”（Next Generation: Reflections and Future Perspectives on Higher Education in the Former Soviet Union）的会议论文。